

华声视点

农村如何留住年轻人搞农业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8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同时指出,要采取有效措施,使一部分年轻人愿意在农村留下来搞农业,培养和稳定现代农业生产队伍。

上世纪80年代初期,随着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代农民工的出现,农村劳动力大批转移至城市,与这些廉价劳动力造就的“经济奇迹”并肩而来的,则是中国农村发展长期不足的代价。因人员流失而导致的大量农村问题,近些年来一直成为焦点,如耕地撂荒、村落空心化、留守儿童和老人的生存及心理健康等。这些问题的出现,揭示出在城市经济的迅猛推进之下,与农村发展之间存在的“零和博弈”关系。曾经提出的“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

乡村”的社会发展愿景,在资源与分配的不公之下,不仅没有成为现实,反而因为大量劳动力的抽离、现有农村资源的被破坏,而导致了制约乡村发展,阻碍农民回乡的沟壑。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政策实施之下,一些硬件条件得以改善,但作为“托底”的青年劳动力的缺位,却难免使“新农村”的发展后劲受到质疑。在劳动力短缺的现实下,目前农村的规模经营难以形成,同时在科技推广受限的情况下,极大影响农业的产出,更直接威胁到粮食生产安全,而这些,恰恰是建立一个科学、现代化的新农村的基础。

按《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2》的统计来看,目前共有2亿多年轻人流动在城市,这意味着留守农村的青年人所剩无几。同时

因为这些年轻的流动人口绝大多数属于“农民工二代”,如果说第一代农民工还有着与农业、农村较为贴近的理念和劳作能力,那么第二代农民工无疑已经远离了父辈们曾经熟悉的生活。相对落后的农村现状,以及完全陌生的农业技能,都在拷问着他们回归故土后的发展后续问题。

欲使农村留住年轻人,自然不是一句“农村天地大有作为”的口号就可以的。美国目前以占人口总量2%的务农人数养活98%的人口,这无疑靠的是技术成熟的优势,我国在农业技术与生产率上的落后,跟一些发达国家相比,已呈百倍的差距。青年农民不乏有知识者,原始的劳作方式显然对他们毫无吸引力,技术的这块短板能否补上,也是

可否吸引和留下青年劳动力的因素。另外,务农者在待遇与社会地位上的提升,尤须得到制度的支持与保护,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所滋生出的身份歧视,是导致大量农村人口逃离乡土,欲进城寻找一席之地的原因之一,在政策推行的过程中,如何以制度性的方式确保务农者收入的提高,确保其社会地位的上升,这都是农村发展的刚需,也是吸引农村人留守土地的软件建设。

“国以农为本”,我们从农村和农民那里获取了绵绵不尽的发展力量,如果到最后农村成了一个最大的发展缺口,这会是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巨大悲哀,着眼于此,在技术、资源、分配等方面真正做到合理,那么,或许青年人回到农村的路才不会那么漫长。

■本报评论员 张英

非常语录

“辛苦几十年,不如体制内分套房!”

29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分析,大学生爱考公务员,一个重要原因是公务员是“铁饭碗”。破除公务员“职业崇拜”,首先要打破“铁饭碗”、破除“终身制”,建立“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用人机制。通过推广聘任制等用人制度,建立科学合理的公务员退出机制,彻底改变“一考定终身”的状况。

渔在大海:让公务员像企业单位一样买社保,退休后领取相应的社养老金,恐怕会有助于解决问题。

雨打萍:国家培养的人才不去搞科技开发,却热衷于当官,这是民族的悲哀!

脑子里都是迹:考上的被人骂,没考上的在这骂人,眼红别人福利好自己考去。

截稿新闻

中联重科回应媒体质疑

本报11月29日讯 随着三一重工迁离湖南的事件遭热炒,某媒体今天发布了《三一恨别长沙 梁稳根的内心独白》一文,中联重科晚间回应,称该文的描述严重违背事实。

中联重科声称,该媒体在没有进行基本调查的情况下,以专访三一集团高管人员的形式,对中联重科进行了大量虚假不实的报道。中联重科表示,从成立之日起,公司一直将诚信、守法作为企业经营的基本准则,文中所述相关内容,已对中联重科的企业声誉和品牌形象造成了严重伤害,将保留对上述恶意中伤者法律追诉的权利。

■记者 李治

时务观察

农地流转既要提高补偿标准更要确权

11月28日,国务院通过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对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征收补偿制度作了修改。有业内专家推测,此次修改,主要内容是提高征地补偿数额,提高额度可能至少为现行标准的10倍。

现行法律中“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30倍”的规定,等于是完全剥夺了农民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权利。而由此带来的补偿标准过低,正是引发农地征收纠纷的矛盾之源。按现行规定,一亩地一般征收补偿不超过6万元,折合到每平方米补偿不足100块钱,而政府征收后一转手就可以通过招拍挂600万元卖给开发商,巨大的价差导致了矛盾频发。

余以为

别将“不要孩子”和房贷压力扯到一起

早上打开电脑,发现好几家网站转载了11月29日《现代快报》的一条报道。其中一家网站的标题是《研究生为还贷兼职开出租,年近四十不敢要孩子》,另一家则是《房贷啊房贷!高薪研究生兼职开7年出租车》。

仔细看了《现代快报》的电子版,才知道这两家网站的编辑“陆冠张戴”。新闻中的研究生叫张明,他开出租车是为了还开公司借的200万元贷款。他的一位搭档陆路才是为了还200多万元的房贷而开出租车的。不过,新闻中确实有这么一句:因为背着贷款,两人虽然年近不惑,但都没要孩子,“我俩想法也很一致,等一身轻了再要,承受不起”。而且陆路

自称月入“差不多1万5”。

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房价偏高、还贷压力大,是人所共知的事。希望楼市调控能有更大力度,也是“房奴”和待购族的心声。但如果把“不要孩子”归因到房贷压力,就有点矫情了。个人的自主选择,不能无限制地归因于社会的“绑架”。孩子有好多种养法,虽然以前农村那种“多一个人多一双筷子”、仅仅满足简单生存需求的抚养方式已很少见了,但“月入1万5”总还是能养活孩子的。

其实,“房奴”也是自己选择的生活。很多“房奴”等不及像日本等国的年轻人一样大学毕业先租房、一二十年后买房,也不愿像香港年轻人一样住着很小

的房子,房屋消费在毕业后不久就要“一步到位”。如果选择先租房再买房或等孩子大点再当“房奴”,“月入1万5”养个孩子是可以做到的。

在得到确权的新模式下,只要是非公共利益的用地需求,农民都有权选择对自己而言最划算最有利的交易方式和交易对象,农村土地真正成为保障农民利益的宝贵财产。要保护农民权利,让农民更好地分享土地增值收益,提高征收补偿标准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明确公共利益,让农民拥有直接参与交易的权利。

■盛翔

我很想给那些因为房贷压力大、一把年纪了还不要孩子的人进一言:生孩子也是技术活,要“适季”!据11月23日《深圳特区报》报道,近年来深圳超低体重新生儿明显增多,救活一个花费20万元,但仍有一半的孩子活下来后,会或多或少患有后遗症,原因就是“父母年轻时因为工作赚钱错过了最佳生育年龄”。

“赚够了再生”,要么可能生不出,要么是高危生产,这对自己和孩子都是不负责的。

■何足道

推荐

政协委员到底能不能是外国人

近日,俏江南董事长张兰已确认注销中国户籍,且已申请退出政协。作为一个外国人,她是否还有资格继续担任北京市朝阳区的政协委员,这是人们关心的问题。

外国人能否担任政协委员,这在今年的两会期间即成为热点。彼时坊间传闻杨澜等极具社会知名度的政协委员已经加入外国国籍,舆论哗然。尽管这些说法未经证实,但此类事件能够成为热点,正表明公众对于政协委员国籍问题的关注。

公众关注政协委员的国籍是公民权利意识的体现。政协委员由最为广泛的各界、各族爱国人士组成,为各个群

体的利益和诉求发声,代表各个阶层参政议政。公民关注政协委员的国籍,正是在关注自己权利主张的表达效率。

张兰的外国籍被确认之后,北京市朝阳区政协一名官员表示,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中,并没有关于禁止外籍人士担任政协委员的明文规定。言下之意,成为外国人的张兰,担任朝阳区政协委员并无不妥。但今年两会期间,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的新闻发言人赵启正曾对此问题做出过明确的答复:“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如果有外国国籍就自动放弃中国国籍,政协委员外籍是不行的。”同是来自官方的答复,却说

法各异,这样的状况,也是造成公众判断混乱的重要原因之一。

政协委员的国籍问题不是一个娱乐事件,而是一个涉及权力和权利的严肃话题。也因此,即使已注销中国国籍的张兰已退出政协,对政协委员是否可以由外国人担任依然要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如果政协委员确实可由外国人担任,那么就应该给出能够说服公众的理由;如果不可以,也应该在相关政策法规中予以明晰,并对现有政协委员的国籍予以全面清查,将所有不符合条件的委员悉数清除出去。在确定相关政策之时,更应广泛征求民意,听听公众的意见。

■摘编自《晶报》



中国福利彩票2012年11月29日开奖号码	
3D 第2012327期	3 1 0
双色球 第2012141期	红色球:03 05 08 19 20 27 蓝色球:09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